

◇依据教育部推荐的中学生必读书目编写

主编：傅璇琮 彭定安 刘继才

◆ 苏杰 编著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韩愈散文

诠释与解读

我与中外文学名著对话系列丛书

★“我与中外文学名著对话”系列丛书★

主编 傅璇琮 彭定安 刘继才

韩愈散文诠释与解读

苏 杰 编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愈散文诠释与解读/苏杰编著. —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2.12

(我与中外文学名著对话/傅璇琮, 彭定安, 刘继才主编)

ISBN 7-5007-6364-6

I. 韩... II. 苏... III. 韩愈(768~824)—古典散文—文学研究—青少年读物 IV. I20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94775号

我与中外文学名著对话

韩愈散文诠释与解读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编著: 苏杰
责任编辑: 赵海力

责任校对: 贺泽红
责任印务: 李建国

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电话: 086-010-64032266

邮政编码: 100708
传 真: 086-010-64012262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230 1/32
2003年1月北京第1版
字数: 630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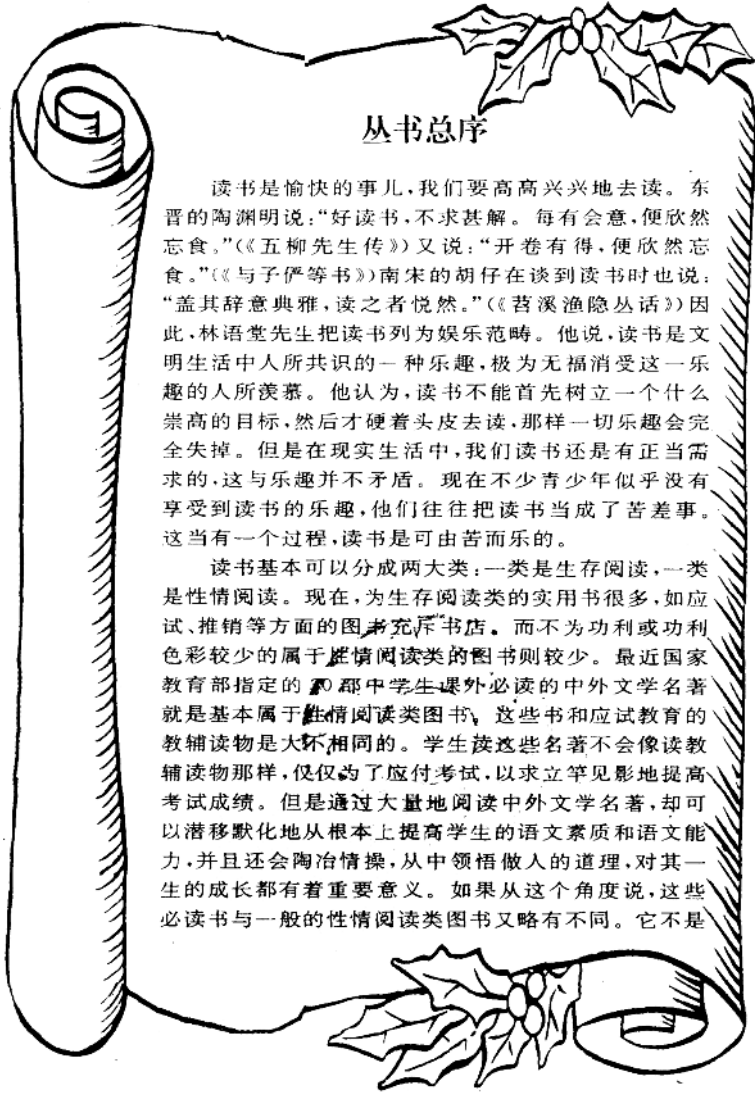
印张: 315
200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5000

ISBN 7-5007-6364-6/1·410

定价: 600.00元(全套50册)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随时向本社出版科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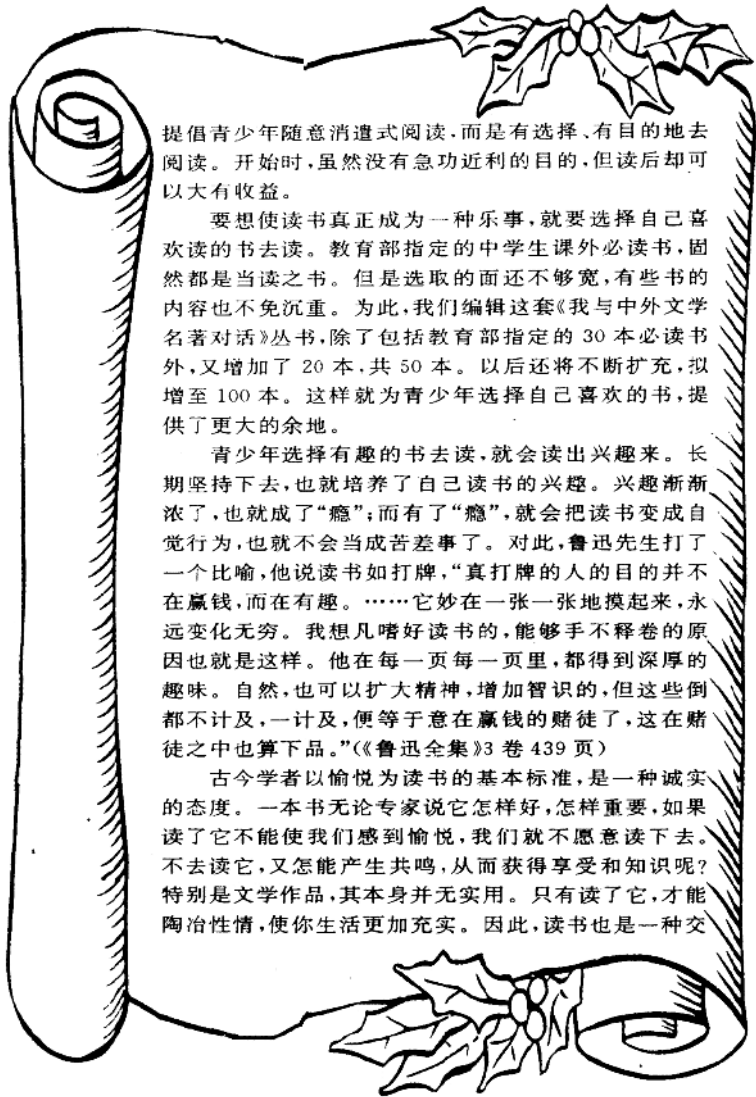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丛书总序

读书是愉快的事儿，我们要高高兴兴地去读。东晋的陶渊明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又说：“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与子俨等书》）南宋的胡仔在谈到读书时也说：“盖其辞意典雅，读之者悦然。”（《茗溪渔隐丛话》）因此，林语堂先生把读书列为娱乐范畴。他说，读书是文明生活中人所共识的一种乐趣，极为无福消受这一乐趣的人所羡慕。他认为，读书不能首先树立一个什么崇高的目标，然后才硬着头皮去读，那样一切乐趣会完全失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读书还是有正当需求的，这与乐趣并不矛盾。现在不少青少年似乎没有享受到读书的乐趣，他们往往把读书当成了苦差事。这当有一个过程，读书是可由苦而乐的。

读书基本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生存阅读，一类是性情阅读。现在，为生存阅读类的实用书很多，如应试、推销等方面的图书充斥书店。而不为功利或功利色彩较少的属于性情阅读类的图书则较少。最近国家教育部指定的《全国中学生课外必读的中外文学名著》就是基本属于性情阅读类图书。这些书和应试教育的教辅读物是大不相同的。学生读这些名著不会像读教辅读物那样，仅仅为了应付考试，以求立竿见影地提高考试成绩。但是通过大量地阅读中外文学名著，却可以潜移默化地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和语文能力，并且还会陶冶情操，从中领悟做人的道理，对其一生的成长都有着重要意义。如果从这个角度说，这些必读书与一般的性情阅读类图书又略有不同。它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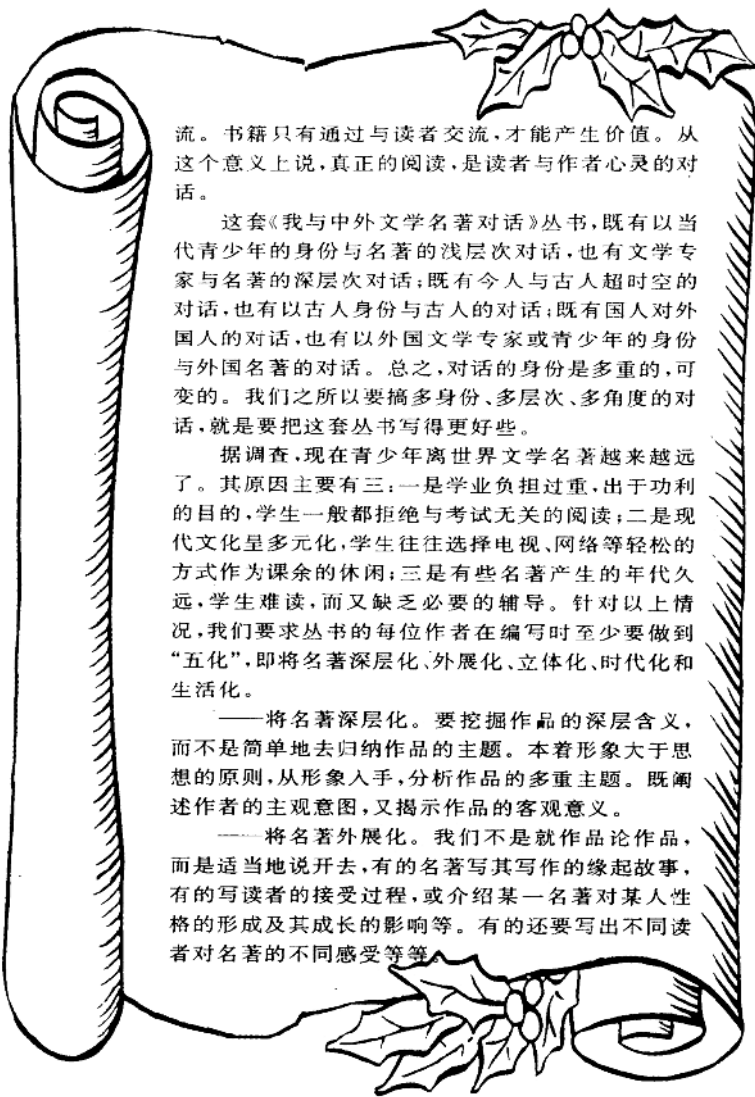


提倡青少年随意消遣式阅读,而是有选择、有目的地去阅读。开始时,虽然没有急功近利的目的,但读后却可以大有收益。

要想使读书真正成为一件乐事,就要选择自己喜欢读的书去读。教育部指定的中学生课外必读书,固然都是当读之书。但是选取的面还不够宽,有些书的内容也不免沉重。为此,我们编辑这套《我与中外文学名著对话》丛书,除了包括教育部指定的30本必读书外,又增加了20本,共50本。以后还将不断扩充,拟增至100本。这样就为青少年选择自己喜欢的书,提供了更大的余地。

青少年选择有趣的书去读,就会读出兴趣来。长期坚持下去,也就培养了自己读书的兴趣。兴趣渐渐浓了,也就成了“瘾”;而有了“瘾”,就会把读书变成自觉行为,也就不会当成苦差事了。对此,鲁迅先生打了一个比喻,他说读书如打牌,“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它妙在一张一张地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凡嗜好读书的,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页每一页里,都得到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智识的,但这些倒都不计及,一计及,便等于意在赢钱的赌徒了,这在赌徒之中也算下品。”(《鲁迅全集》3卷439页)

古今学者以愉悦为读书的基本标准,是一种诚实的态度。一本书无论专家说它怎样好,怎样重要,如果读了它不能使我们感到愉悦,我们就不愿意读下去。不去读它,又怎能产生共鸣,从而获得享受和知识呢?特别是文学作品,其本身并无实用。只有读了它,才能陶冶性情,使你生活更加充实。因此,读书也是一种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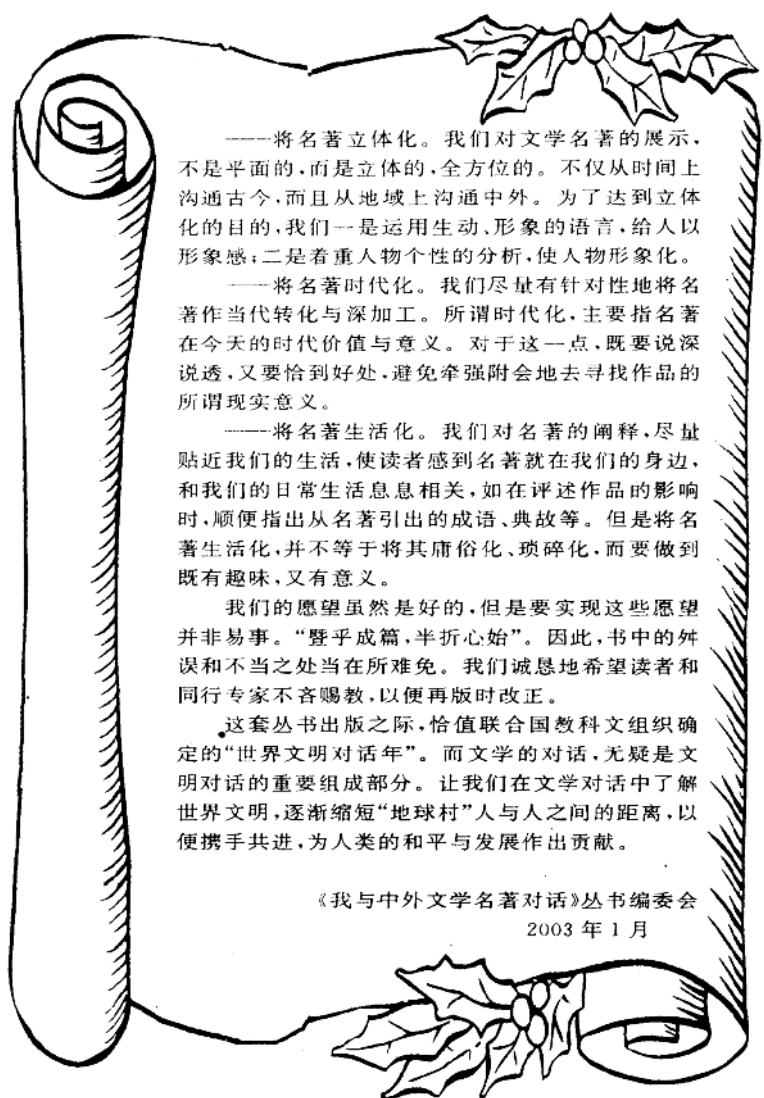
流。书籍只有通过读者交流，才能产生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阅读，是读者与作者心灵的对话。

这套《我与中外文学名著对话》丛书，既有以当代青少年的身份与名著的浅层次对话，也有文学专家与名著的深层次对话；既有今人与古人超时空的对话，也有以古人身份与古人的对话；既有国人对外国人的对话，也有以外国文学专家或青少年的身份与外国名著的对话。总之，对话的身份是多重的，可变的。我们之所以要搞多身份、多层次、多角度的对话，就是要把这套丛书写得更好些。

据调查，现在青少年离世界文学名著越来越远了。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学业负担过重，出于功利的目的，学生一般都拒绝与考试无关的阅读；二是现代文化呈多元化，学生往往选择电视、网络等轻松的方式作为课余的休闲；三是有些名著产生的年代久远，学生难读，而又缺乏必要的辅导。针对以上情况，我们要求丛书的每位作者在编写时至少要做到“五化”，即将名著深层化、外展化、立体化、时代化和生活化。

——将名著深层化。要挖掘作品的深层含义，而不是简单地归纳作品的主题。本着形象大于思想的原则，从形象入手，分析作品的多重主题。既阐述作者的主观意图，又揭示作品的客观意义。

——将名著外展化。我们不是就作品论作品，而是适当地说开去，有的名著写其写作的缘起故事，有的写读者的接受过程，或介绍某一名著对某人性格的形成及其成长的影响等。有的还要写出不同读者对名著的不同感受等等。



——将名著立体化。我们对文学名著的展示，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全方位的。不仅从时间上沟通古今，而且从地域上沟通中外。为了达到立体化的目的，我们一是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给人以形象感；二是着重人物个性的分析，使人物形象化。

——将名著时代化。我们尽量有针对性地将名著作当代转化与深加工。所谓时代化，主要指名著在今天的时代价值与意义。对于这一点，既要说深说透，又要恰到好处，避免牵强附会地去寻找作品的所谓现实意义。

——将名著生活化。我们对名著的阐释，尽量贴近我们的生活，使读者感到名著就在我们的身边，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在评述作品的影响时，顺便指出从名著引出的成语、典故等。但是将名著生活化，并不等于将其庸俗化、琐碎化，而要做到既有趣味，又有意义。

我们的愿望虽然是好的，但是要实现这些愿望并非易事。“暨乎成篇，半折心始”。因此，书中的舛误和不当之处当在所难免。我们诚恳地希望读者和同行专家不吝赐教，以便再版时改正。

这套丛书出版之际，恰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界文明对话年”。而文学的对话，无疑是文明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我们在文学对话中了解世界文明，逐渐缩短“地球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以便携手共进，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我与中外文学名著对话》丛书编委会
2003年1月

目 录

一、引言	1
(一) 少年立下宏图志 为官为文多坎坷 ——韩愈的时代与生活	1
(二) “文起八代之衰” 力兴“古文”之盛 ——韩愈倡导的中唐古文运动	9
(三) 文以明道言志 根茂实遂创新 ——韩愈的文学主张	15
(四) 京城一见“忘形交” 长恨二人不相从 ——韩愈与孟郊	21
(五) “同官尽才俊” 偏善宗元柳 ——韩愈与柳宗元	26
(六) “抗颜为师”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韩愈与师道	33
(七) 无往而不适 堪为百世师 ——韩愈散文的文学特色 (一)	39
(八) 无往而不适 堪为百世师 ——韩愈散文的文学特色 (二)	45
二、名篇解读	51
原毁	52
进学解	60
讳辩	69

送李愿归盘谷序	74
送孟东野序	80
答李翊书	88
圯者王承福传	96
蓝田县丞厅壁记	102
画记	108
柳子厚墓志铭	114
三、名作赏析	125
师说	126
杂说（四）	134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	139
祭十二郎文	145
张中丞传后序	154
后记	162

一、引 言

(一) 少年立下宏图志 为官为文多坎坷

——韩愈的时代与生活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晚年官至吏部侍郎，故后人称之为“韩吏部”，死后谥为“文公”，故世亦称之为“韩文公”。著有《韩昌黎集》。

韩愈生活在平定安史之乱后的中唐，这一时期是唐朝社会由极盛转向衰落，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由顶峰转向衰退的时期。盛唐的开明政治、繁荣的经济和活跃的思想文化氛围，孕育出了无数的思想、文化英杰。安史之乱之后，转向衰落的唐朝虽然在宪宗当政的十几年间出现了“中兴”，但从盛唐就积累下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使社会陷入更加严重的危难之中，藩镇割据、诸侯反叛、宦官擅权、朋党之争，以及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磨砺玉成了一大批立志改革的有识之士，促使更多的人冷静地观察和思考。韩愈正是这样的时代环境产生出的思想家、文学家。

韩愈出生在世代为官，且世代能文的家庭。其先世祖汉、魏之时曾封王为侯，通显于时。韩愈的父亲仲卿曾与李白、杜甫交游，叔父云卿在大历年间曾被赞誉为文章冠世，哥哥韩会“善清言，有文章”，颇受当时文坛名家李



华、萧颖士赏识。这种家风、家庭环境对韩愈一生所追求的为官为文的人生道路势必产生一定的影响。

韩愈出生在安史之乱平定后的第五年，当时社会经济尚未得到恢复，国家和人民承受着战乱所带来的苦难。韩愈自幼父母双亡，由长兄嫂抚养成人。十岁时，长兄韩会因受宰相元载牵连，由负责记录皇帝日常生活、言论行事的起居舍人贬为韶州刺史（现广东韶关）。韩愈随兄长途跋涉来到远离中原的岭南。不久韩会死于贬所任上，韩愈随嫂郑氏水陆劳顿，将韩会的灵柩运回河阳安葬。这时的中原军阀割据、战乱四起，郑氏又带着一家幼小，避战乱于宣城韩氏别业。社会的不安，家庭的变故，使韩愈从小就过着流离困顿的生活，饱尝了人生的苦难。而孤苦的身世，又激发了他刻苦学习、应举及第、成一番事业的志向。“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旧唐书》本传）。他七岁开始读书，聪颖过人，十三岁便已能文，在寄居宣城的四五年中，他潜研经史百家，饱读孔孟儒学之作，已感到时俗好尚骈文的弊端，初步萌发了复兴儒道的意念。同时他也积极关心现实，留意于古今兴亡得失，“念昔始读书，志欲干霸王”（《岳阳楼别窦司直》），“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与凤翔邢尚书书》）。

贞元二年（786），十九岁的韩愈怀着经世之志进京求士。途中经过中条山，写下了《条山苍》诗，这是韩愈步入人生旅途写下的最早的述志诗，诗中写到：“条山苍，河水黄，浪波沄沄去，松柏在高冈。”程学恂《韩诗臆说》中说：“十六字中，见一生气概”。到京城后，他满怀信心地上书朝廷，却不见回应。不久，韩愈便遇到了贫困的威胁，他囊空如洗，穷不自存，发出了“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出门》）的感叹。韩愈在长安先后四次参加进士考试，

均未中第。落第的处境使韩愈备尝求士的苦涩，也初步了解了社会和人生。直到贞元八年（792）进士考试，经佐梁肃推荐，主考陆贽同意韩愈才进士及第。韩愈与同受梁肃赞赏而被一同举荐的李观、李绹、崔群等同登榜第。当时梁肃共荐举8人，均榜上有名，“时称龙虎榜”（《新唐书·欧阳詹传》）。陆贽为当时骈文的改革者，梁肃为古文家独孤及的弟子，力倡古文，为文坛所推重。韩愈倡导古文，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陆、梁的影响。

按唐代制度规定，礼部进士及第仅仅是具备了做官的资格，进士们还需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词科的选拔试，考上了才能授官职。韩愈考中进士后，连续三次参加吏部博学宏词考试，均未中选；又三次上书宰相求仕，也始终未见回复；曾三次登门拜访当权者，又都被守门人拒之门外。京城求官无望，加之经济拮据生活艰难，韩愈无奈之中怀着“不遇时之叹”，离开长安东归河阳。途中见到向皇帝进贡鸟者横冲直撞、耀武扬威，不禁感慨生悲，写下《感二鸟赋》诗，心情愈加失望和惆怅。贞元十二年（796），宣武节度使董晋任用韩愈为观察推官，韩愈与董晋同往汴州，从此结束了十年求仕无门的处境，踏上了仕途。在董晋幕府当节度使的幕僚，对身怀大志而家境贫困的韩愈来说，实在是迫不得已。观察推官只是奉命为文，或处理一些文书杂务，并无更多的事情可作，这给韩愈广交文友提供了机会。在汴州近三年中，先后有孟郊、李翱、张籍等人来聚。韩愈除了指导李翱、张籍等人学习外，已在倡导古文运动，宣传散文革新的主张，反对崇尚骈文。贞元十五年（799），董晋去世不到四天，汴州发生兵变，韩愈因为董晋护丧去洛阳而免于祸难。家人脱离险境后，全家来到徐州，被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安置在符离睢上，后又被张建封荐为节度推官，聘为幕僚。幕僚之职虽然不愁生计，但并非



韩愈的理想官职，他在给好友崔群的信中说：“贤者宜在上位，托于幕僚则不为得其所。”加之他“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新唐书》本传），难以忍受张建封及其同僚的“累累而行，役役逐队，饥而食，饱而嗜”，不久便离开徐州回归洛阳。贞元十七年（801），韩愈赴京参加并通过了吏部的选拔考核，回洛阳待命，这期间写下了《答李翊书》等，系统阐述了散文革新的理论，为古文运动的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贞元十八年（802）春，韩愈被调任国子监四门馆博士。唐代的国子监是礼部管辖的国家最高学府，内设国子学、太学、广文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七种，教师分博士、助教、直讲等几个等级。这一“传道、受业、解惑”的职位，使韩愈有机会向国子监的学生直接、系统地宣传儒家学说，为他从事文学活动，倡导古文运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由于韩愈当时在文坛上已有名望，加之他所推荐的举子相继及第，一时间有许多青年后生或登门请教，或投书请益，时人称之为“韩门弟子”。为了使古文运动更好的发展，韩愈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进行古文创作，写下了《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祭十二郎文》等与时俗骈文不同的散体单行文章，而且还积极指导“韩门弟子”等后学青年研学儒经，向他们传授古文写作的理论和文章作法。在“师道之不复”风尚盛行的社会里，韩愈的做法遭到了“好为人师”的讥笑与诽谤。为了纠正当时只重“请托干谒”，不重师道、耻于求师的不良风气，韩愈写下了著名的《师说》一文，详尽地阐明了师道的重要性，严正批驳了官僚士大夫们只重门第官位，从师学道的风尚早已不传了的恶劣习气。韩愈的主张得到了柳宗元的有力支持，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

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对世人讥笑诽谤韩愈提倡师道的不良风气进行了批判。

贞元十九年（803），韩愈由四门博士升迁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为御史台所属，职责是监察百官、巡按州县。监察御史的职位，给了韩愈从政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他上任仅半年，就两次上书议论朝政时弊：一次是“极论宫市”，一次是“论天旱人饥”。论天旱人饥是韩愈从政后影响较大的一件事。贞元十九年，京畿大旱，“田种所收，十不存一”，灾情十分严重。政府虽然有令减免租税，但官吏们仍然暴收聚敛，百姓苦不欲生。韩愈亲睹“饿者何其稠，亲逢道边死”的惨状，如实上奏《论天旱人饥状》，指出京畿灾情严重，而群臣谎报年景，皇帝不知灾情，恳切要求“特勅京兆府”停征赋税。身为监察御史，据实上书皇帝，本无可非议，但韩愈的建议不仅未被采纳，反而遭幸臣所谗，被贬为连州阳山（今属广东）令。阳山穷荒僻远，人迹罕至，距京城近八千里，“天下之穷处也”。韩愈情绪低落，心情十分抑郁。在阳山任上一年多，除了作些政务外，更多的是读书、交友、吟诗作文。值得欣慰的是在他的朋友中不少是不畏艰险，专程赶来向他学习、请教作文方法的。韩愈在对古文写作追随者的教诲中，不断将古文运动推向深入。贞元二十一年（805）夏，韩愈遇赦离阳山至郴州待命，在这期间韩愈潜心著述，完成了《原道》、《原毁》等重要论著的写作。同年得赦书移官江陵（今属湖北）府任法曹参军，有《荆潭唱和诗序》等文，在这篇诗序中，韩愈提出了“文穷而后工”的理论。元和元年（806）六月，韩愈奉召回京，权知（暂代）国子监国子学博士，与张籍、孟郊、张彻等朋友相知相聚。不久因担心再次遭到谗陷而迁往东都洛阳国子监任教。元和四年（809），韩愈

任尚书省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并判祠部，他根据《六典》把东都寺观的管理权从宦官手中收回祠部，并整顿风纪，杀了一批不法僧尼道士，引起宦官们的极大不满，遂被降职为河南令。以后又历任职方员外郎、国子博士，以比部郎中的资格任史馆修撰，专门从事本朝历史的撰写。韩愈对任史馆修撰一事颇多顾虑，认为修史应“据事迹实录”，使“善恶自见”，但自古以来凡实录作史的人不是遭到人祸，就是受到天刑，“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担心实录召来刑祸。柳宗元得知韩愈所想之后，寄书批评了韩愈，语重心长地激励他要敢于实录修史，接受《顺宗实录》的修撰重任。元和十年夏，韩愈完成了《顺宗实录》的修撰，全书比较客观详细地记录了顺宗即位期间发生的朝政大事，表现了韩愈实录修史的敬业精神。这期间先后写了《张中丞传后序》、《毛颖传》、《送穷文》、《进学解》等文，反映了他的愤世嫉俗和郁郁不得志的愤懑。

元和九年（814），韩愈改任考功郎中，并以考功郎中身份知制诰。考功隶属尚书省吏部，主管文武百官功过善恶的考核与行状。知制诰主要是代皇帝起草文书。在对淮西吴元济叛乱征讨的问题上，韩愈极力支持主战派，曾上奏《论淮西事宜状》。元和十一年，韩愈被提拔为中书舍人，是朝廷中较重要的职位，但仅几个月，韩愈就因得罪了主和派而被从朝廷权力中心排斥出来。元和十二年（817），韩愈以行军司马的身份随宰相裴度出征讨伐叛贼。平叛中裴度采纳韩愈的建议拟派精兵抄小路入蔡州生擒吴元济，正要行动之时，唐州节度使李愬雪夜先袭蔡州，生擒吴元济，告淮西叛乱平息。回京后，年已五十的韩愈以军功授刑部侍郎。次年奉诏撰写《平淮西碑》，经过七十多天的劳作，写成了《平淮西碑并序》。因文中多叙裴度之功，李愬心中不服，李愬妻向宪宗投诉，宪宗诏令磨去碑

文，由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其实韩愈并未抹煞李愬的战功，只不过是更突出了裴度而已。韩愈的碑文虽被推倒，却一直为后人所称道，宋代苏轼《临江驿》诗云：“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宪宗自凤翔法门寺迎佛骨进京供奉，一时京师内外，朝廷上下，无论王公士庶，均奔走相告、施舍膜拜。韩愈早就对崇佛不满，对佛教的盛行深恶痛绝。他毅然谏迎佛骨，上《论佛骨表》，以东汉以前的历代帝王均未信佛却寿长位久详论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宪宗大为震怒，予以死罪论处。幸有裴度、崔群等挺身而出，替韩愈求情才使韩愈免于死，发落为潮州（今广东潮州）刺史，再贬岭南。后遇大赦，改为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韩愈赴潮途中，得知好友柳宗元逝世的消息，十分悲痛，先后写了《祭柳子厚文》、《柳子厚墓志铭》，追悼怀念柳宗元，并遵柳遗嘱为之托养遗孤。韩愈在潮、袁二州时间虽然不长，却关心民生疾苦，尽心尽力地为当地作了一些兴利除弊的事，受到当地百姓的颂赞。

元和十五年（820）穆宗即位，韩愈奉诏内调为国子监祭酒，四进国子监。国子监祭酒是总管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七学之长。他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国子监进行整顿，使国子监的学风有所改变。长庆元年（821），韩愈由国子祭酒转任兵部侍郎。次年二月，韩愈奉命去镇州宣慰，行程吉凶未测。他不顾个人安危，昼夜兼程，疾驰入镇州，大义凛然劝降乱军将士，终化干戈为玉帛。凯旋后转吏部侍郎。长庆三年（823），调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尹是京城最高长官，京兆在韩愈的治理下，“盗贼止；遇旱，米价不敢上（涨）”（李翱《韩吏部行状》），社会秩序

安定。后因与御史中丞李绅不协，调为兵部侍郎，又改任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824）五月，韩愈告病在城南别墅休养，张籍、贾岛等常去探望，十二月卒于长安靖安里，终年五十七岁。

纵观韩愈一生，自小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虽大半生颠簸困顿，仕途多有坎坷，但始终追求为官从政、治家治国的人生目标。年轻时就立下报国大志，“报国心皎洁，忧时泪九澜”；仕途二十余年中，尽管宦海沉浮身不由己，但他始终关心国事，同情人民疾苦，在唐代突出的宦官、藩镇、佛道等问题上，他不顾官职升迁甚至个人安危，敢于反对宦官专权，主张用兵削平藩镇，谏迎佛骨反对佛道，表现出进步、积极的政治态度。韩愈在应举求仕、为官为宦的长年累月中，一有机会就宣传儒学，不顾诋毁，招收后学，“抗颜为师”，从理论到实践上倡导、创作古文，形成了在中国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中唐古文运动，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